

前言：在偶然與命定的夾縫之間

這一切彷彿是命定的。

2015年，從9月14日到9月18日，整整一週，在日本最高政治中心「永田町」，每一天，都有上萬人聚集於此，當中許多人，年齡不過30歲，而非傳統參與護憲運動的嬰兒潮世代。這是戰後日本，自「反安保鬥爭」以來最大的學生運動，今年六月起，每個週五都有上萬人在此集會，一種新型態的抗爭文化浮現了，或站或坐，佔領了國會前狹窄的通道，借用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的話來說，是在沒有廣場的東京，硬是製造出廣場。此外，廣場上，充斥著各式各樣「反對戰爭法案」跟嘲諷首相安倍晉三與日美關係的標語，環繞著英日語交雜的饒舌樂，“Tell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?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!”，此起彼落地響著。對他們而言，國會等同於民主嗎？佔領於斯，才是民主的展現。

靠著大規模群眾聚集、過半民意反對通過「安保法案」，原本如散沙般的在野諸黨意外地團結起來反對「安保法案」，甚至一度在參議院引爆肢體衝突，但最終仍在極短的時間內，未經充分討論的情況下，由安倍領頭靠著執政黨多數於9月19日凌晨逕行通過「安保法案」。

這是戰後七十年的東京，執政黨在國會被包圍的情況下靠著多數強行通過爭議性法案，這戲劇性的一幕，卻幾乎是1960年反安保學運跟岸內閣對抗的廿一世紀翻版，只不過，這次的對壘的主角，換成了岸信介的外孫——安倍晉三，與其對立的，則是跨校大學生組織的反安保團體SEALDs¹。

與五十五年前的抗爭較之，雖是不同的臉孔，但場景、戲碼皆極為類似，連角色都好似預先安排好的。而抗爭的兩端，差異明顯更勝以往，安倍象徵的是戰前延續至今的傳統政治家族，經歷過二次大戰、美軍佔領、經濟起飛、72年「沖繩返還」以及90年代起「失落的三十年」的傳統政治菁英，另一邊則完全不同，長於「和平憲法」運行數十年的戰後日本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們從未見證經濟成長率第一的日本，為世人稱頌的「日本模式」已成歷史，在他們成長的年代，製造業乃至電子業的榮景不再，沒有年功序列、沒有終身雇用制、沒有企業工會，只剩付不起的龐大學貸跟彈性的僱傭關係.....。

事後以結構觀之可能有其說服力，但運動的爆發真是如此必然嗎？若把鏡頭轉回2012年底，在當時，狹著高民意支持當選的安倍，或許怎麼也猜想不到，當選後不到3年，一個大學生組成的讀書會，會同樣以強大的民意基礎，萬人集會的大眾民主運動，「襲擊」亞洲的民主燈塔——多項指標都被Freedom House評選最自由的——日本國會。

台日兩場抗爭背後的結構情境

表面觀之

，先後發生在台日

的兩場抗爭，同樣是學生領頭「反黑

箱」立法，且國會皆為兩場抗爭的關鍵地景，其次，與其對立的執政者——不論是馬英九，或是安倍晉三——

皆以高票當

選。更宏觀的層次上，

這兩場抗爭所面對的皆是，在國際政治經濟結

構上舉足輕重的「外來勢力」。此外的意外插曲是，SEALDs

成員奧田愛基在國際記者會時，提起了台灣與香港的抗爭，因此許多媒體、評論者，將這一場發生於日本國會前的抗爭與去年台灣的佔領運動相提並論。

不過實際上，兩者在抗爭的劇碼、行動以及口號等面向都非常不同，這些已是眾所皆知的「老生常談」。然關鍵在於，台、日兩場抗爭所面對的相異的政治格局。

日本的抗爭，一如55年前的反安保運動，本質上攸關日本自1945年以來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——

麥克阿瑟留給日本人的政治遺產——

核心是日本和平憲法（所謂「非戰」憲法，即放棄戰爭、武力以及宣戰權），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為，日本在美國的「庇護」下而免於戰爭，以及戰爭責任的處理，有論者稱之為[僅限於]

一國的和平主義。然而隨著冷

戰的結束，國際地緣政治的變遷，日本無法再安穩享受冷戰

帶來的好處，舉例而言，91年波灣戰爭起，日本政府陸續在不同戰事場合派出自衛隊協助。

相對地，在台灣，冷戰的結束，意味著過去的「穩定」與經濟優勢不再

，90

年代、千禧年以來，儘管中國始終未放棄對台主權宣稱，在中國登上世界舞台且日益重要的過程中，兩岸先是恢復經貿往來，隨後在扁馬兩總統

任內加速且制度化兩岸交流，一直到去年春天運動的爆發以及馬總統在中美關係間的進退失據後，更多更新更複雜的政經計畫仍不停席捲而來。

假設日本抗爭者要面對的是，如何在後冷戰的全球化時代，在實務上提出和平主義的實踐方案？對台灣的抗爭者而言，核心問題則是實務上如何面對中國（以及美國）的政治經濟計畫？

具體論之，時至今日，新的不穩定因子的加入，諸如中

國的「一帶一路」以及其於區域的崛起、擴張，中日在泰國、印尼等國爭奪發展、援助計畫，美國大動作調整對外政策，重返亞太，相關的軍事、經濟政策相繼出現，族繁不及備載，調整了既有地緣政治秩序。

雖然各自要面對的核心問題跟優先次序不同，且台日兩政治體在國際體系的重要性殊異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既然兩國的抗爭都直接牽涉地緣政治層級的變動，因而，從台灣角度出發，在新的國際政經格局下，應該如何理解日本新生代的反安保運動，並進而找到可能的行動方案？

民主與台日關係？一個另類的視角

那麼，首先，從台灣的角度，應該如何看待這部在日本被稱為「美國民主禮物」的進步憲法呢？

在此，我要借用前總統李登輝的發言作為參照點，重新閱讀其於9月在日本雜誌《Voice》投書〈揭開日台合作的新帷幕〉，他從自身從政經驗中的六次修憲——同時也是近代台灣政治民主轉型的契機，側面開展他對日本憲法第九條的看法，以下摘錄內文：

政治必須要日新又新。對現在的日本來說最大的課題是如何修正做為國家根本的憲法。由於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禁止日本保有軍力，所以現在的日本是將自己國家的安全保障，以半委託美國的方式來解決。日本如為了要做到真正的自立的話，則無法不面對修憲的問題。我個人認為六十多年來憲法隻字未改，反而是比較異常的。

一九八八年，我就任總統時，在台灣是由國民黨政權實行著獨裁統治。我那時認為會造成獨裁的根本原因，是在於不符合台灣現狀的「中華民國憲法」。雖說碰到許多困難，但過程中靠著民眾的支持，以經濟成長的維持與社會安定為背景，一滴血都沒流地完成六次修憲，成就了「寧靜的革命」，這是我一生的驕傲。

顯而易見地，李登輝要藉由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憲改經驗，證成日本今日「安保法案」立法、修改「九條」的正當性，在其新書《新·台灣的主張》中更進一步申論，在現今國際局勢的變化，尤其因為中國在東亞的擴張，和平憲法已經顯得不合時宜。但這一「不合時宜」與彼時推動台灣修憲的「不合時宜」不盡相同，這點也可從李文得到佐證，六次修憲的憲改工程的條件之一是「靠著民眾的支持」。簡言之，李登輝文中忽略了修憲在兩國的脈絡差異，而將台灣經驗誤植於日本安倍意義下的憲改情境。

為什麼兩國會有這樣的差別？要解答這個問題，須將憲法視作目的，且將其與制定、修改憲法的手段區分開來，這麼一來，並不難理解這一差異的主要肇因。戰後台灣，或中華民國的憲法，是在國民黨這一威權體制下成立的憲法，修憲不但是將之台灣化，更是民主化的一環。較之戰後日本的憲法，是在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(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)佔領期間主導所制定、施行，在這一體制下——儘管被稱為軟性威權(soft authoritarian)——

日本有了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，當然也包括禁止日本參與、發動戰爭的憲法第九條。日本憲法背後的美國陰影，象徵著日本不完整的人民主權，因而憲法議題在日本有了一種為奇特的樣貌，保守派為了保護「主權」支持修憲，反之進步派為了保護「人民」而支持護憲，在這一弔詭的體制下反覆交戰數十年，僵持不下而未果.....。

受台灣的民間團體，在318

後嘗試由下而上發起新憲改運動啟發。因此，一個非常天真且「離地」的想法是，或許日本應該由民間，結合老中青年的進步團體，由下而上，發起新的憲改運動，重新制定日本

國的憲法，透過人民的力量——而非帝國強權施捨的——用日文

重新寫一次憲法，

假使不希望和平憲法被修改，就應該如此民主地賦予「九條」意義。這樣的主張是，應透過民間在地發起運動，來確認民主社會裡憲法的核心意涵——人民主權。無論支持或反對修改非戰憲法，這麼一來，也許方有可能超越日本戰後體制的弔詭、矛盾及延伸而來的諸多紛爭。

最後，回到「安保法案」本身，容我再重述兩點，一是安倍主持下通過的「安保法案」，若將之與李登輝時代的憲改經驗相比，可說幾無民主正當性，二是儘管情況不全相同，但台日兩國同處於「後冷戰」的新的混亂的全球化時代，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各方面皆然，正因為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言外之意是，台日兩國抗爭者的位置並不必然因單一議題而對立。

進一步言，我們處在這樣的時代，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得背負更多，相較於我們的先行者，在抗爭之外，我們似乎被期待要了解各式各樣的問題，它們或者涉及地緣政治、軍事，國際政治經濟等不同面向，討論服貿時，我們要回答雙邊貿易或是區域貿易協定的內容跟影響；亞投行議題火熱時，我們要回答有關人民幣國際化、國際發展援助等問題；安保法案要通過時，我們要懂國防或軍事，還要回答中美以及區域內各國的軍事部署，這並不是抱怨，亦非無的放矢，這或許是我們生於此長於斯的責任，卻也意味著更多艱難的抉擇。

也許有一天，處於帝國夾縫的我們，不得不在美中主導的政治秩序間選邊站，但每當陷入這類道德或政治爭議抉擇時，我不由得想起，去年的夏天，我在沖繩見到的每一張臉孔。當時，有位沖繩的朋友問我，你認為台灣跟沖繩[在政治上]有什麼雷同之處嗎？「我想或許是，大多數時候，不論是沖繩或台灣，我們沒有辦法決定自身的命題吧。」我說。

所以，與其討論是誰啟發了誰，誰又影響了誰，我倒寧願期待，在東亞可見的未來，弱小國家裡的人們間，確實存在著些許對等的串聯契機。

作者施懿倫政大哲學系學生

註解

[1]其前身為讀書會TAZ(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)，奧田愛基於2012年發起。隨後在2013年因「特定秘密保護法」組成SASPL(Students Against Secret Protection Law)，一開始只有10個成員。如今在關西、仙台、沖繩等地都有隨之響應的在地SEALDs團體。